



11月30日的座谈会大概进行了100分钟。行政法学者马怀德、廉政制度建设专家任建明、反腐败研究者何增科、以哲学视角的制度创新为研究特色的辛鸣、比较政治专家周淑真、行政法学者姜明安、党建杂志《求是》的研究员黄苇町、政府管理专家程文浩见到了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。

这位现年64岁的官员着西装但没打领带，提前10分钟到会场，并打破以往由副书记主持会议的惯例，在脱稿发言和互动交流中，听取了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。

“王某人”

周淑真11月25日接到中纪委通知开会的电话。这不是她第一次接到类似邀请。《新京报》报道，“自2000年以来，几乎每年，数10位专家受邀参加中纪委的座谈会。”赴会前一天，有朋友特意提醒：“嘿，周老师，王岐山的会可要认真准备，是不准念发言稿的。”

果然，笑呵呵的王岐山一进门就声明“新文风新会风”。

首位发言专家开口就是“尊敬的王书记”，话没说完，就被王岐山打断，他请大家少说客套话，并借用丘吉尔的话“如果给我5分钟，我提前一周准备；如果是20分钟，我提前两天；如果是1小时，我随时可以讲”，提醒大家“说长话容易，说短话不容易”，提高会议效率。黄苇町感觉，“一股新风扑面而来”。王岐山点评他的发言：“你念了稿子，没有展开。”

对王岐山的干练作风，姜明安也印象深刻，他记得为鼓励专家们放开讲，王岐山一开始就说，“网络上骂我们的，我都看得听得，何况我们都是朋友，你们放开讲，不用有顾虑。”

周淑真准备了12分钟的发言。她有些紧张，因为自己就坐在王岐山对面，发言时书记一直看着她，不过这样她也有了讲话的冲动，“他真的挺认真，目不转睛，那眼神是要求我们必须把所思所想讲出来”。

“参加我王某人的会，不能念稿，要深刻思考。”散会时王岐山又强调了一遍。

观点争鸣

会议的开放作风使得专家学者可以畅所欲言，由于观点不一，还形成热烈讨论。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。

“第一是反腐败是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工作，有的专家认为要打持久战，要长期地反腐；有的认为持久战跟现下公众的期待不一致，要搞攻坚战，快速遏制腐败势头。这个是一个争鸣。”马怀德回忆说。

姜明安就是提出“持久战”的学者，他提出应该制定一个反腐的5到10年规划。

而马怀德觉得，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，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建设，要在法治轨道上反腐败，“不能靠运动式的反腐。”马怀德记得，听到这里，王岐山还专门插了一句，“地方好像还挺适应这种运动式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。”“我是建议不要搞运动，不要搞风暴，要制度。”马怀德反复强调了这一点。

第二个争论是在财产申报制度上，对于要建立财产申报制度，达成共识，问题在如何操作。“是新任领导公开、提拔的公开，还是全都公开，是只公开房产、工资收入，还是要公开配偶子女移民情况、就业就学情况。”

周淑真和姜明安觉得“一刀切”有困难，全面申报“技术上不成熟”。周淑真建议“新人新办法，旧人旧办法”，“要升职、从政，就要申报一下。做几年之后，财产增加的情况就有了一个对比。”他觉得这样操作阻力更小，更容易实施。

黄苇町赞同，并进一步提出，财产申报可以从房产申报试点，“一套房价值多少钱，也跑不了”，可以从省级、副省级官员开始试点。

马怀德有不同看法，“我觉得财产公开，应该是全方位公开，不是仅公

“文章太守”李天岑

鲁钊



中原作家李天岑，以现实题材小说著称，尤以《人精》、《人道》、《人伦》劝诫小说三部曲著名，其改编的电视连续剧《小鼓大戏》在中央台3次播出，20多家省市台轮番展播，荣膺第25届中国电视金鹰奖。他任地级市领导干部多年，因文而后兼河南作协副主席，被戏称“文章太守”。

李天岑少时家贫，有时连红薯饭都不够吃，为生重担挑子走村串庄做剃头匠，深知民生唯艰。曾任职150万人的县级市邓州市市委书记，此地花州书院为范仲淹撰《岳阳楼记》处，他倡导和践行新时代“忧乐精神”。他说，一个领导，要能够百姓操心费神而失眠，能够在看到群众贫困时直冒冷汗，才能达到忧的境界。他经常到乡下找人聊天，田间地头，农家小院，头对头蹲地上，啥都说，很开心，接地气，既了解民情，便于工作，又可搜集素材。他任职间，是邓州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。

处身官场，他看到许多人忘记过去背叛宗旨，落得不好下场，感叹在关键时候没把握住，就开始写劝诫小说，其作充盈中国先贤的古风遗韵和人生哲思。有个官员因贪欲入狱后读了他的书，说早看李天岑的书，就不会走到这里。

李天岑为人平和宁静，“看人都是人”，无论谁到他办公室，他都要泡茶一杯，他说，润喉润心。无论高官布衣，他都要送出楼道，态度谦和。一次，有上访老农在门口蹲着，他走过去问清楚问题，引到相应部门。老农说，这师傅真好，干啥的？他说，我种花草的。有作家为孩子上学发愁，他借人大代表视察机会，向校长介绍该青年作家如何有潜力，校长深受触动，大开绿灯。

未能抛却少年梦，一半勾留是文情。他说，对待生活不留心，就会像河水里的水和天上的云一样，白白地游走蒸发，不留踪影。他随身携带两个包，一个公文包，一个写作包。写作包里装着书、杂志、剪报本，有意思的故事段子或忽生灵感，马上记下来，看到好文章剪下来。那次他出差到南方，打出租付钱时，一拉包，赫然一把剪刀，出租司机脸都吓白了。

作家二月河说：官做得好，文章也写得好的人，历史和现实不多。天岑官当得不错，作家也当得不错，他对作家这个身份很珍惜，几十年来痴迷创作，很让人佩服。

雷达评价：中国的文学，向来有警世、喻世和醒世的传统，李天岑的笔法，有劝谕讽喻意味，并杂以河南民间方言，有道地批判精神和喜剧精神，这也许是其作品受到喜欢的原因。

李天岑女儿对父亲的人生有一个总结：前半生因文得官，后半生因官得文。

开房产、工资收入，对个人申报的重大事项，组织掌握的，我觉得都需要公开，这有利于社会监督、公众媒体的监督。第二，我觉得这个公开不应区分，新提拔的干部要公开，过去的不开，这种差别的安排不符合法律的平等性质，要公开大家都公开，不分新老，不管是提拔的还是不提拔的。”考虑到具体实施中的问题，马怀德觉得，可以先试点，试点后立法，“通过政府公开法，将官员财产公开纳入到里面。”

无论是反腐还是财产申报，对于制度设计，黄苇町觉得还是要谨慎，“差的制度比没有制度还要糟糕。”他记得王岐山也认同了这一点。

对于学者们的发言和讨论，王岐山听得很认真。

“三把火”与“润物无声”

能够争鸣，是学者们的核心期盼。

早在今年7月份，周淑真就应人民论坛杂志社之约写了讨论新政治观的稿子，其中大部分是对于反腐败的看法，可是直到9月份，稿子也没发。她暗自嘀咕，“不会是写得太尖锐了吧？”到了十八大前后，两篇文章终于都得以发表。十八大召开，提出三清政治：干部清正，政府清廉，政治清明。十八大一结束，周淑真就被邀请参加反腐座谈会，“我觉得，这是新班子要开工干活啦！”

北京大学宪法和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发言说，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老百姓切齿痛恨的腐败，不仅应烧“三把火”，而且应烧多把火。王岐山总结，“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，不大搞动静，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。”

讨论结束后，王岐山还向与会专家推荐了一本书，“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，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，希望大家看一下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。”

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，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，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，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，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，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，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。

对于这次座谈会，姜明安觉得挺振奋。他记得在会议结束时，王岐山说，“今后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们是我们的智囊。”

（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12年第43期）

围棋大师 陈祖德

王晶晶



68岁的陈祖德于2012年11月1日晚在北京协和医院结束了自己的“棋局”。

如果只是看照片，人们会用儒雅这个词来形容他，但那些熟悉他，或者与他交过手的人知道，这个看上去谦和的人，骨子里非常刚毅。他喜欢雨果和拿破仑，爱看拳击，喜欢和人掰手腕。即使坐在棋盘前，他喜欢的也是短兵相接，他所代表的“中国流”布局，就是以快速进入战斗而闻名。

即使对面对坐的是大人物，他也不会再在棋盘上留情面。10岁时，陈祖德和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下过一盘棋。这个瘦弱、一说话就脸红的小男孩，一旦捏起棋子，就忘了老师“要讲礼貌”的叮嘱，而是猛杀猛砍、步步紧逼。那时，他学棋刚刚3年，老师是教过吴清源的顾水如。

陈毅非但没有生气，还对这位小朋友说：“陈祖德，你要把老前辈的本事都学过来，要超过他们。”但在那个闭塞的年代，中国棋手只能定期去新华社剪报，搜集日本《读卖新闻》上每天连载的棋局“豆腐块”来学习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围棋还承载着中日民间交流的“政治任务”。第一次去日本，18岁的陈祖德紧张得被日本媒体形容为“好像在接受入学考试”。这个看上去像文弱书生的年轻人，一年后在北海公园悦心殿里，战胜了被称为“棋仙”的日本九段棋手杉内雅男——9小时鏖战，最后赢了对手半个子。他迅速成为和雷锋、王进喜一样高大的偶像，还在民间掀起了一股久违的“围棋热”。

实际上，由于实力悬殊，这盘棋是在日本棋手“让先”的情况下才获取胜利的。中国棋手还要再过20年才能真正赶超日本。但在当时，陈祖德的胜利被赋予了某种象征意义，“他掀起了我们赶超日本的序幕”，聂卫平说。

因为“文革”爆发，纵横交错的棋盘一度变得空荡荡的。1969年，国家围棋队被撤销，陈祖德被下放到“五七干校”，后来又分配到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当工人。他并没有放弃，而是不停地给领导写信，呼吁恢复围棋。那时，和他一起分配到工厂的还有6位棋手，经常有围棋爱好者慕名前来找“七君子”对弈，其中就有黑龙江农场的聂卫平。

1973年，在周恩来的努力下，国家围棋集训队恢复。只不过，已经7年没有好好下过一盘棋的陈祖德在日本一直都在输。有人劝他别下了，可他说：“一个真正的棋手哪有打退堂鼓的？棋手可以不要命，但就是要赢，要胜利！”

这个总想着要超越自我的人，即使在五七干校打土坯时也一样不肯服输。他还和当地人比赛，半天打250块，最后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，下棋时只能用一只手托着腰。有一次，他和12个小棋手同时对局，下完棋腰疼了3天。“我这辈子，折腾得太厉害了。”

去世前，他曾这样对徒弟刘小光说。

1980年，陈祖德开始便血，随后又吐血，被送入医院检查出罹患胃癌。胃被切除了一多半，又因输血感染了黄疸性肝炎。即使躺在病床上，他还在问：“我还能参加比赛吗？”医生没有回答。他把头埋起来哭了，觉得自己连再拼一次的机会都没了。

但他并没有就此认输。在医院躺了5个月，吃半个煮鸡蛋要花30分钟时间，他就开始以每天500字的速度写自传。“作为一个围棋手，我的运动生命是结束了，但这绝非我的终点，而是我新的起点。陈祖德可以不是围棋手，但陈祖德永远是一个围棋工作者。”他说。

让他被更多人记住的，正是这本名为《超越自我》的自传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以连播的形式播出。许多年轻人中午守在收音机旁，被他的励志故事所吸引。

跨过死亡这道坎后，陈祖德离开了棋盘，进入国家体委工作，分管棋牌。

1989年，陈祖德重回棋坛，两年后成为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。在他任内，中国围棋等级分制度和围棋甲级联赛体系创立。他保持着一些看上去苛刻的生活习惯，记日记，早上4点多起床，放弃专车接送，从方庄步行到天坛附近的棋院。8点前到办公室，先下一盘快棋再上班。

刘小光觉得，性格像棋子一样黑白分明的陈祖德并不适合官场。为了引进国际象棋的一个干部，他和领导吵了起来。当对方以“要按规矩办”搪塞时，他放下狠话：“如果你不答应，我就辞职。”

因为健康原因，陈祖德在59岁时提前退休。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，他去外地讲棋。他怎么会跟人谈价钱，有时难免被骗，只能回来跟刘小光念叨：“这人不地道。”

2011年，死亡隔了31年再次前来赴约。他被确诊患上胰腺癌。他对刘小光说：“我心里有准备，如果最后没有希望，我想选择安乐死。”可后来，他似乎改变了主意。开始和时间赛跑，整理历史上留下来的经典棋谱。他躺着，除了透析、打点滴，就是摆弄着架在床上的磁力棋盘，对每一张棋谱进行讲解、注释。以前，他每周讲一盘棋，生病后速度反而加快了。只不过他一天比一天瘦，每一次录像的时间也从最初的50分钟缩短到15分钟。

这个曾经说自己不擅长“收官”的棋手，在10月31日的下午，突然有所预兆地对刘小光说：“万一我来不及，后面的棋谱你来帮我整理。”陷入昏迷前，陈祖德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翻着整理了一半的棋谱，念叨着“白20手有问题”。

在死亡赢得这局棋之前，他拼尽全力又落下了一枚棋子。

（摘自2012年11月7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



中国还将继续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摸出更多更大的石头。

——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近日驳斥某些言论对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“歪解”，称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摸到的三块大石头。

十八大报告不是文言文，不必过于解读；也不是小学课本，不必像孩子那样背诵复述。十八大说要改革，你就说你怎么改就好了。

——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微博转发一位领导干部的学习体会。

第一，长篇小说因体积大、包皮厚，容易掺假注水，泥沙俱下。而短篇篇幅短小，节奏均衡，不容杂芜和放纵，更接近诗性和纯粹文学艺术的本质。第二，短篇小说一般来都是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，对现实有极强的穿透力。第三，短篇小说出手快，能对现实做出快速反应，以速度体现其力量。其四，短篇小说还被称作孔貌性文体，因为阅读起来无须占用读者多少时间。

——作家刘庆邦反对时下盛行的长篇崇拜。

中国资本市场是为融资者设计的，为国企改革设计的，而不是为广大投资者设计的。

——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谈股市制度。

我认识丁光训主教，是在上世纪80年代。90年代末负责联系基督教工作后，我和我的同事多次专程到南京他的寓所当面请教。那时丁主教担任基督教全国两会名誉主席、会长，不再负责教会的具体工作，但作为深孚众望的教会领袖，教会大事还会请他定夺。

丁主教思想敏锐，富有远见，但又平易近人，说话轻柔，脸上始终保持着那迷人的微笑。不管他是否同意你的观点，都会非常耐心地倾听，通过不断询问弄清你的本意，然后很有条理地表达他的意见。如有书面材料，他会从头至尾认真阅读，逐字逐句进行修改。他信仰虔诚、品德高尚、学识渊博、为人宽厚，散发着非凡的人格魅力，是我人生道路上难得的良师益友。

如果说吴耀宗先生是中国基督教的先知，丁光训主教就是中国基督教的旗帜。



丁光训主教

丁光训 爱不止息

王作安

新中国诞生不久，西方世界弥漫着对新中国妖魔化的气氛，丁主教却毅然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，把自己投入到了祖国的命运之中。几十年来，丁主教不仅要求基督徒要热爱自己的祖国，还不时向外国朋友赞美自己的祖国，介绍新中国发生的一切积极变化。他说：“真正的爱国主义为民族的落后和蒙受的耻辱而忧伤，为祖国人民的解放和成就而欢乐。”

丁主教认为，“基督徒的信仰就像有两个中心的椭圆，是两个C，基督和中国（Christ and China）。基督教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壤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。”中国基督教发起三自（自治、自传、自养）爱国运动时，丁主教以严谨的态度深入了解三自爱国运动的深远意义后，坚定地支持，并成为真正的旗手。丁主教说，三自爱国运动是提倡中国基督徒发扬民族自尊心，热爱祖国，同祖国同胞走在一起，想在一起，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，将教会植根于我们祖国的土地之上。

丁主教是一个有很强使命感和事业心的人，他一直思考着中国教会面临的挑战以及正确的回应。1993年中央提出，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。丁主教积极响应，同时强调，不能满足于政治表态式的适应，有思想基础，包括神学思想上的适应才是真正的适应。丁主教曾这样描述神学思想建设的远景：“我们的前瞻和远景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教会，它的神学思想是丰富的，不反理性的，比较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，它能够帮助信徒树立比较和谐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见证。”

从1952年到2010年长达58年的时间里，丁主教一直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，悉心培养教会人才。几十年来，从金陵协和神学院走出来的2000多位毕业生，大多数已成为各地基督教组织、基督教堂点和基督教神学院校的中坚力量。

丁光训主教曾与赵朴初、罗冠宗等十几位全国政协宗教界委员联名提案，要求恢复1954年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。1982年12月全国人大通过的新宪法，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作了较大修改，得到了一致肯定。

在国际基督教界看来，丁主教就是中国教会的象征。丁主教多次率领中国教会代表团出国访问，介绍中国教会情况，解读中国宗教政策，发表具有独到见解的神学演讲，成为外国基督教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。

《圣经》上说：“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。”丁主教已离我们而去，但他对祖国和民族深沉的爱，对中国教会深沉的爱，依然坚强有力，永不止息！（作者为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）

